英國文化與香港：1945–97

馬翰庭（Mark Hampton）著
羅美嫻（Ring Mei Han Low）譯

HKU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https://hkupress.hku.hk

© 2025 香港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88-8900-88-6（平裝）

版權所有。未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電子或機械）方式，包括影印、錄製或通過信息存儲或檢索系統，複製或轉載本書任何部分。

Hong Kong and British Culture, 1945–97, by Mark Hampto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UK. © Mark Hampton 2016.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0 9 8 7 6 5 4 3 2 1

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圖片說明列表 ix

原序與鳴謝（2016年初版）. x

新序（2024年新版）. xiii

導言　英國文化與香港：1945–97 1

第一章　英國文化眼中的香港：戰後景況 16

國際與本地背景　16

在港英人：個人的背景　29

結語　43

第二章　香港戰後的經濟不干預資本主義論述 44

比英國更英國的香港維多利亞經濟　49

克拉維爾筆下的香港　54

無愛於財　59

自由不干預政策與華人性格　63

維多利亞價值觀及其不滿　69

第三章　男士的花花世界與玩樂生活. 75

俱樂部與體育活動　78

論述中的風月世界　85

結語　103

第四章　秩序與現代化的論述. 105

都市叢林亂象與秩序建立　108

新界的現代化　120
新界與城鎮規劃　126
基礎建設　128
第五章　良政治理 137
威權主義與不干預政策　138
縮小與公眾期望的差距　145
「非民主的問責制」　154
民主與去殖化方向　158
第六章　華人的英國性 166
情感英國性　167
工具英國性　175
第七章　1997的敘述 193
關於1997年的小說化表述　208
後記：回歸後的宿醉 219
參考書目 227
其他主要（英語）參考文獻 230
索引 239

原序與鳴謝（2016年初版）

此書的創作，不單源自於學術的研究，背後還有一個自身的小故事。而這故事也湊巧發生在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編輯部的附近，大約一英里的地方。記得1996年的時候，我還是一個美國大學的研究生，正在撰寫一篇有關《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對於1899至1902年南非戰爭報導的文章。在那兒我遇上了一位從香港來的年輕女士，她當時正在曼徹斯特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當我發現她竟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並非英國人的時候，我很是驚訝。此事回想起來，實在感到尷尬。那時我對於香港的認識是多麼的有限。當時恰逢中英關係的活躍期，距離政權交接還不到一年。香港獲得不少新聞報導突出的關注，也叫我對於這個曾被英國管治的城市有了日益增長的新認識。而隨着這位新朋友跟我到美國，並最終同意嫁給我，我對香港歷史的興趣也變得越來越濃厚。

然而，教學和博士論文的研究與發表不斷佔據着我的時間，此志趣也被擱置了一段日子。不單如此，要寫一本有關香港的書，似乎也是一個十分艱鉅的任務，那時我既從未到過亞洲，也不太曉得如何憑着我在喬治亞州一個以教學為主的小學院教職，能籌集所需的出行研究經費。直至在2005至2006年學術休假期間，多虧一個偶然的機會（以及 David Pomfret 在申請資助的卓越能力），我有幸得以在香港大學擔任一個學期的訪問學者。這次對香港的初探，不僅加深了我對其歷史研究的興趣，更叫我對這座城市一見鍾情。不到僅僅五天，我便申請了嶺南大學的職位，該職位我至今已經擔任八年。到了2007年，我便開始着手研究撰寫此書。

在撰寫此書的過程中，嶺南大學研究委員會十分慷慨地提供了研究支持，讓我得以參訪美國、英國和澳洲的檔案館。感謝嶺大研究支援辦公室 Connie Lam（林小波）所展現的高效專業，研究資金的一切管理與申批極其順利。此外，這書的完成也曾得多位研究助理的寶貴協助，包括 Timothy Wales 在倫敦的研究支持，以及 Penelope C. Y. Pang（彭靜儀）、鄒一正、Ceci Tam（譚穎之）、羅國暉和 James Fellows 在香港的協助；而 Simon Case 則負責了格式整理和索引編製工作。

此外，我也非常慶幸得到嶺大博學無私的同事們的巨大幫助：樂美德（Mette Hjort）和 Paisley Livingston 是極為寶貴的導師。Grace Ai Ling Chou（周愛靈）和潘淑華分享了她們對香港和中國歷史的深入見解。戴仁柱（Richard Davis）、Niccolò Pianciola 和 James Fichter 為我的分析提供了不同領域的視野。羅永生和許寶強則分享了他們對香港文化理論的專業知識。也感謝嶺大歷史系辦公室的兩位助理敖頴妍和黃佩儀，她們極高的行政管理效率以及積極愉快的工作態度，讓我有更多時間投入此書的研究和寫作，也使我每天在校的工作成了樂事。

此書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研究範疇，感恩得到來自各方各處的學術同僚的協助，令我獲益良多，當中不乏舊雨新知。Simon Potter 和 Adrian Bingham 是我早期因對新聞歷史的興趣而結交的好友，他們分別就帝國史和性別史給我提供了寶貴的建議。麥志坤和葉健民解答了我一些初入門的問題。大衛・克萊頓（David Clayton）則跟我分享了他在香港相關檔案方面有如百科全書般的豐富認識，並具挑戰性地促使我把「文化」植根於香港的歷史背景與實況（儘管我不確定是否完全成功）；他還很慷慨地分享了他未發表的研究，並就着我撰寫的有關香港歷史部分的初稿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見。而巴里・高斯比（Barry Crosbie）和斯圖爾特・沃德（Stuart Ward）跟我的交談討論，以及他們對某些章節的評語和意見，也助我把香港的歷史置於更廣闊的帝國歷史背景中。夏思義（Patrick Hase）以歷史學家和九七前政府官員的雙重身分提供了他的專業知識。而我在陸恭蕙的辦公室裏所作的訪談，問及了陸女士有關在英國管治時代晚期她的政治活動和動機，她也非常友好地回答了我。最後，高馬可（John Carroll）閱讀了整個手稿，回答了我許多非常具體的問題，並且是最讓我感到有信心可完成此書的一位好友。

本書引用了多達30多個不同機構與圖書館的館藏與文獻，我很感謝當中所有的圖書與文獻管理工作者，並鳴謝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和製作團隊。還需感謝所有曾參與在不同地方舉辦跟這課題有關的學術研討會及講座的聽眾學者，包括香港大學、哥本哈根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約克大學的研討會與講座、亞洲學者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交叉路口文化研究會議（Crossroads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帝國思維研究會議（Empire State of Mind Conference）、國際媒體與歷史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History），以及2014年春季學期我與研究生們的閱讀小組。最後，本書第二章的節略版本曾發表在 Barry Crosbie 和馬翰庭編輯的《英國世界的文化建構》一書中；[1] 也感謝出版社允許我們重印這個章節。

能成功研究和撰寫一本書，不僅需要專業學者的合作與知識分享，還需要好友與同事們在執行上的支持以及研究過程中的精神鼓勵。自1995年以來的多次研究外訪中，Rohan McWilliam 和 Kelly Boyd 兩位好友的盛情，總叫我在探訪倫敦時感受到家的溫暖，每次跟他們相聚暢談都是我旅程中的亮點。而 Peter Mandler 曾邀請我參與劍橋大學的高桌晚宴，並慷慨地跟我分享了研究資料。Tom O'Malley 則常在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接待我。而 Simon Potter 也曾在牛津和布里斯托（Bristol）招待我。

我曾把我的第一本著作獻給了我的太太羅美嫻（Ring, Low Mei-Han）。儘管她也激勵了我寫下現今這本書，但是我這次把書獻給她的父親羅勝，相信她也必能諒解。她的父親在二戰結束後還是一個小孩子，在極其嚴峻艱難的環境下，半合法地逃到了香港，即使所受的教育極為有限，並且不得已地在英國管治時期的地下經濟中謀生，卻仍支持了他的女兒分別在亞洲的香港、歐洲英國的曼徹斯特和北美的布法羅（Buffalo）三地取得了三個學位。當九七前的英國官員說英國人擁有天才般卓越的行政能力，但卻是城中的華裔民眾以他們龐大的能量，把香港從一塊荒涼之地轉化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偉大的都市，他們所指的，就正是羅勝先生的人生。

1. Barry Crosbie and Mark Hampton, ed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British Worl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新序（2024年新版）

這次《英國文化與香港：1945–97》的重新發行，為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叫我在成書差不多十年之後，再一次反思此書的初衷，以及看到有如所有創作一樣，它如何是作者自身情境的產物。

這本書的起源，來自好幾個境況的結合：其一是源於我對英國文化史，特別是英國本土歷史的學術興趣；其二是我的婚姻所引發的個人興趣，因我太太在回歸前的香港出生，曾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簡稱 BN(O) 護照；後來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最後，也關乎着我自身的經歷，因我在2007年從美國移居到香港。那是我在2006年春季學術休假期間擔任訪問學者後所做出的決定。而作為這地方的新居者，為了更好地了解我的新家，我廣泛地閱讀了當代香港及其近代的歷史。起初，我是盡量以可騰出的閒時來做這件事情，因為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仍是英國新聞歷史。然而，慢慢叫我感到越發有趣的是，我發現能完整地融入到英帝國歷史框架中的香港討論原來相對匱乏，而在英國文化史的框架中得到敘述的就更為稀少（這當然也有例外，此書別處也有所提及）。誠然，在英國殖民管治這題目的歷史討論中，是有不少跟香港發展有關的文獻的；而香港自1960年代末便成了英國最為重要的「殖民管治地」，卻極少在這方面的歷史敘述中被觸及。從更廣泛的層面上來說，英國「失去帝國」的文化經驗，和此經驗對塑造當代英國的意義，似乎直至最近才逐漸吸引到學術界的關注。而這本書則是針對全球去殖時期英國文化歷史跟香港互動的首個探索之例；也就是說，此書以香港作為探索英國自身歷史的一個切入點。這雖是本書的強項，但也是其有所欠缺和未有覆蓋某些題材的不足之原因。例如，在〈華人的英國性〉

一章中的敘述裏，其實可以就着香港與廣東的聯繫和當時大量移居到港的人口互動作更深入的討論。另一個相對遺漏的是君主制的敘述，在本書中幾乎沒有提及，儘管我後來在另一項研究中試圖補談了這一點。[1]

我很快便留意到香港在英國文化史學中的相對缺席，而部分的原因是由於這向度與大多數的主流敘事都不太契合。1970年代，當英治下的香港開始進行最為密集的改革和基建時，英國的「帝國時代」已經結束。因此，英國國內的歷史敘述往往將「去殖化」（decolonization）視為一種收尾工作，論述的重點多放在福利國家的共識、經濟繁榮與衰退主義，以及青年文化與包容社會的發展；而在這些討論中，大多迴避了香港跟已逝英帝國的關係。[2]這也許並不叫人意外，其實到了今天，已有不少學者曾經提及，戰後的英國人經常顯出一種「集體的刻意遺忘」（collective wilful amnesia），甚至會否定自1945年後來到英國的各前「殖民地」移民，是與英國的帝國歷史有關。[3]也正因這緣故，儘管不少學者提出於19世紀和20世紀初，英帝國整體與其本身國內的文化之間存有一種「相互建構」（mutually constituted）的關連，但卻鮮有學者提及英國歷史上的去殖化——即左丹娜・貝爾根（Jordanna Bailkin）所稱的「帝國後的餘波」（afterlife of empire）——跟英國的本土文化相應的互動關係。[4]

此外，如果有關英國本土的歷史闡述忽略了其本身去殖化的討論，那麼香港在這方面的論述中，也會有所錯配；而近代坊間的作者在這點上都正有此傾向。比如在一些並非直接與香港有關的討論中，馬克思主義學派會談及「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或提到「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但與這些討論的同期，英國卻仍在香港有着直接的管治和控制，並且直到1980年代初，仍抱有希望，欲能在1997年之後（即1898年新界租約到期的日子後）繼續管理香港。當然，也有像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和 A. G. 霍普金斯（A. G. Hopkins）這樣的學者，會區分「旗幟上的主權」（flag independence）和更

1. Mark Hampton, 'The Uses of Monarchy in Late-Colonial Hong Kong, 1967–97', in *Monarchies and Decolonisation in Asia*, ed. Robert Aldrich and Cindy McCree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225–42.
2. 有關此題材的文獻討論是非常廣泛的。如欲查看簡潔的近代戰後英國歷史概述，可參閱 Adrian Bingham, *United Kingdom* (London: Polity, 2022)。
3. 可參閱 Camilla Schofield, *Enoch Powell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 見 Jordanna Bailkin, *The Afterlife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實質性的帝國管治控制；[5] 不過總的來說，在有關英國此時期的討論中，香港就如這段歷史的一個殘餘，甚少得到主流敘述的關注。

以上是我研究 1945 至 1997 年間英國與香港的文化互動時所得的解讀，而在交付手稿的十年後，也是我在開始研究此題目的至少 15 年後，這方面的研究和討論已經有了重大的發展與變化。到了今天，跟此有關的題目已經有許多的專論和研究，當中有對「英國終結」（the end of Britain）的文化和全球歷史的討論，也有研究英帝國對國內文化的持續影響，更有探討當代的英國財富跟帝國的掠奪性和後帝國時期的移民限制的直接關聯的。[6] 而對英帝國的價值與影響的討論，也已經成為英國文化爭論戰場裏的一個重要話題。[7] 雖然英國的政治和流行文化可能會對英帝國有所誤解或有錯誤的表述，但卻已經不能再用「健忘」來形容。

---

5. 此處可參閱：(a)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b) Darwin, 'Hong Kong in British Decolonisation',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ed. Judith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16–32 與 (c) A. G. Hopkins, 'Rethinking Decolon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200, no. 1 (2008): 211–47。而有關英國把香港「去殖化」的觀點，特別是其時間線與換旗時間不同的這一點，在麥志坤的著作中有進深的討論，見 Chi-kwan Mark, *Decolonis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Britain, China, and Hong Kong, 1979–8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3)，以及 Mark, 'Lack of Means or Loss of Will?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1957–1967',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1 (March 2009): 45–71。最後也可參閱 James Fellows, 'Britain,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nlargement, and "Decolonisation" in Hong Kong, 1967–1973',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1, no. 4 (2019): 753–74。
6. 可參閱以下：(a) Stuart Ward, *Untied Kingdom: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End of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b) Charlotte Lydia Riley, *Imperial Island: A History of Empire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Bodley Head, 2023)、(c) Stuart Ward and Christian Pedersen, eds., *The Break-up of Greater Brita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1)、(d) Nadine El-Enany, *(B)ordering Britain Law, Race and Empi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Kojo Koram, *Uncommon Wealth: Britain and the Aftermath of Empire* (London: John Murray, 2022)、(e) Sathnam Sanghera, *Empireworld: How British Imperialism Shaped the Globe*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24)。
7. 見以下：(a) Alan Lester, *Deny & Disavow: Distancing the Imperial Past in the Culture Wars* (London: Sunrise Publishing, 2022)、(b) Robert Gildea, *Empires of the Mind: The Colonial Pas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和 (c) Alan Lester, ed., *The Truth about Empire: Real Histories of British Colonialism*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2024)。

過去幾年，香港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已經有了顯著的發展。此書在2015年印刷期間，布里斯托大學率先創立了香港史研究中心（Hong Kong History Centre），該中心把與此相關的文獻存檔，安排演講系列和舉辦定期的研討會，也培育了多位博士畢業生，當中的博士論文有些已經出版為專著。而在2017年，香港成立了一個「香港學會」，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也開展了「共研香江計劃」。一年後《香港研究》（*Hong Kong Studies*）亦隨之創刊。2021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也建立了一個香港環球研究的交流平台，從這平台的拓展能見到香港研究，包括香港歷史這個範疇，其實在我撰寫此書之前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然而，也突現了這個研究領域到今天已經發展得更寬廣和深入。

在近期這方面的研究當中，有好些文章和書籍也進階地挑戰或深化了《英國文化與香港：1945–97》一書中的論點。如在書中第六章我討論了「華人的英國性」，當中提出了兩個觀點：首先，叫香港的華人成為文化上的英國人這點，並非當時英國政府的一個特定目標；其二，在情感上跟英國連結的「**情感**英國性」（*affective* Britishness）也並非普遍的。第一點是穩固地建基於第一手史料的舉證上的，而我在其他文章中也有所討論；而後者則相對初步，我提出與其以情感上的英國性來解釋，不如用「**工具化**英國性」（*instrumental* Britishness），會是一個更為妥貼的形容。工具化英國性跟英國文化認同的關係不大，但這種英國性所更關注的，是權利的保障，特別是在英國居住的權利，就算那只是作為一個後備計劃。就此，麥志坤後來很詳細並很有說服力地指出，對於香港的華人精英來說，失去英國身分的威脅，不僅僅是對他們權利上的威脅，還是一個深刻的身分認同問題。[8] 而 Vivian Kong（江偉欣）的著作研究的是較早的時期，她比我更深入地描繪了香港所呈現出的不同類型的多種族英國性，並論證了英國性這概念從來不僅是屬於英國本土的，而是具爭議性的，因為即使對於香港的白人英國居民來說，英國性也從未與種族

8. 這只是他更廣泛地描述英國退出香港談判時所提出的觀點之一；見 Chi-kwan Mark, *Decolonis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也可參閱 Mark, 'Decolonising Britishness? The 1981 British Nationality Act and the Identity Crisis of Hong Kong Elites',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8, no. 3 (2020): 565–90。

劃上等號。[9] 假如我在撰寫此書前已能閱讀到江偉欣的研究，本書關於英國性的討論也必會受益於她的精密見解的。

本書第五章討論了有關香港回歸前政府「良政治理」（good governance）的論述。1967 年騷亂之後，政府試圖打造一種非民主的問責性，以展示即使在沒有實施憲制改革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代表着人民，套用 Steven Tsang（曾銳生）的說法，自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 1947 年取代楊慕琦（Mark Young）擔任總督後，憲制改革的可能性已經被「擱置」（shelved）。[10] 為了達到這目標，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政府實施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包括了住房、教育和反貪污方面的改革，同時更通過各種公關的手段來展示政府的問責性。Ray Yep（葉健民）在他的著作中很詳細地論述了麥理浩的改革，尤其重要的是麥理浩如何在英國議會的影響和香港本地的力量之間作出必須的談判與周旋。[11] 與此同期的研究出版也有 Florence Mok（莫欣頴）關於「隱蔽式殖民主義」（covert colonialism）的先導性著作，書中揭示九七前的政府，縱使在需優先顧及英國政府和領地管治利益的情況下，如何透過監控和運用其影響力去平衡公眾意見、合法認受性，以及公眾對良好管治的期望。[12] 同樣在「良政治理」這個題目上，當時英國存在不少評論認為，英治時期的政府透過在香港進行基礎設施項目和規劃，並且通過在城市地區建立秩序，為香港帶來了現代化（modernity）。而自本書的初版後，有關「現代化」這題材的新研究也有顯著的增加，包括了對商業航空和水利基礎設施的研究，比如王迪安所

9. 此處可參閱 Vivian Kong, *Multiracial Britishness: Global Networks in Hong Kong, 1910–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此外，雖然英國性非麥志坤詳細闡述的主題，參閱他所寫的另一本很好的書對了解這點也很有幫助：*Hongkongers in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特別是書中有關二戰退伍軍人爭取認可的討論。而有關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更廣泛的討論，則可參閱以下文章：(a) Catherine S. Cha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Hong Kong History: Them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ed. Man-Kong Wong and Chi-Man Kwong (Basingstoke: Palgrave, 2022), 157–80，和 (b) Iam-Chong Ip,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9)。
10. 可參閱 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5–195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 Ray Yep, *Man in a Hurry: Murray MacLehose and Colonial Autonom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4).
12. Florence Mok, *Covert Colonialism: Governance, Surveilla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British Hong Kong, c. 1966–97*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3).

撰寫的有關商業航空的專著。[13] 與此同時，韓墨松（Peter Hamilton）也有一本極好的著作，書中展示了儘管英國任命了總督並讓香港本地政府管理香港，但香港的華商精英卻日益與美國建立了緊密聯繫，從而促進了中國與全球經濟的融合。[14] 總的來說，如今《英國文化與香港：1945–97》這本書，着重研究英國的社會和政治論述如何描述及評價英國對香港的建立；而新的學術研究則為這個故事增添了更多深入和細緻之處，當中有些甚至顛覆了這些論述所描繪的故事。

本書的英文初版於2015年成書，直到如今，不僅如前述學術領域已經有所更新，現實世界的情況也有了不少變化。在研究和撰寫此書的七年期間，開端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的最後準備階段和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積極應對（這些應對既幫助穩定了全球經濟，也穩定了香港自身的經濟），末端則是2014年圍繞香港與內地關係的動盪。此書的討論集中於1997年前的歷史，除了後記中略有提及過這些事，我並沒有看到書中的觀點——至少有意識地——受到當代的事件所影響；話雖如此，若作進一步的有關討論，相信也會有所涉及。特別是書中的第七章討論到「1997的敘述」（narratives of 1997），探索在回歸前數十年裏的社會上，不同論述對於英國統治所表達的看法。而這些論述，無論是預測性的評論，還是文學性的表達，也是迥然多樣：從謹慎積極的樂觀，到另一極端的末日式悲觀也有。有些人認為香港實際上已經融入了中國，換句話說，「旗幟上的主權」並不像一般人所認為的那麼重要；另一邊廂則有人把希望投放於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上，認為中國是不會把

13. 見以下：(a) John Wong, *Hong Kong Takes Flight: Commercial Aviatio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Hub, 1930s–199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b) David Clayton and Florence Mok, 'Bad Weather and State Building: Household Water Conservancy in Colonial Hong Kong during a Drought, 1963 to 1964',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6 June 2024, accessed 16 February 2025), https://www.liverpooluniversitypress.co.uk/doi/full/10.3828/whp.eh.63830915903594); (c) Jack Greatrex and Florence Mok, 'Catchwater Colonialism: Reshaping Hong Kong's Hydrology, Infrastructure, Metabolism and Landscape, 1937 to 1983', *Urban History* (published online, 18 March 2024, accessed 16 February 2025),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urban-history/article/catchwater-colonialism-reshaping-hong-kongs-hydrology-infrastructure-metabolism-and-landscape-19371968/003CBE66A536F8B-616DA5C172C213E85。

14. 此處可參閱 Peter Hamilton,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導言

英國文化與香港：1945–97

每年的蓋福克斯日（Guy Fawkes Day，又稱「煙火節」或「篝火節」），在英國蘇塞克斯郡的路易斯，五個篝火協會都會在樂隊伴奏和篝火點燃中，帶領着身穿17世紀騎士服裝的隊伍巡遊，以紀念1605年火藥陰謀案的揭發。在這場「大聯合巡遊」（Grand United Procession）中，五個協會當中的四個會跟來自附近城鎮的協會一起，從鎮的一端遊行到另一端。根據阿瑟林頓（Jim Etherington）1993年在其書中的描述：「遊行有超過2,000名協會的成員，伴隨着15到20個樂隊，隊伍長達一英里或更長，整個隊伍可能需要超過30分鐘才完全經過某個地點。」遊行結束後，各個協會會分開進行自己的大遊行，巡遊者會穿着模仿神職人員的服裝，譴責不受歡迎的英國政治家和英國的敵人，以及反對篝火活動的人，[1] 然後，他們便會把這些敵人和福克斯的人偶焚燒。

1997年11月，就是英國撤離香港，香港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四個多月後，同時也正值戴安娜王妃逝世的兩個多月，香港成為了這年路易斯篝火慶典的焦點主題之一：當時其中一個篝火協會演奏《風中之燭》（*Candle in the Wind*）以悼念戴安娜王妃；而另外則有兩個協會紀念香港的回歸，當中「商業廣場篝火協會」（Commercial Square Bonfire Society）展示了總督

1. Jim Etherington, *Lewes Bonfire Night* (Seaford: S. B. Publications, 1993), 9.

彭定康被中國坦克碾壓的人偶場景。[2] 根據當地報紙《蘇塞克斯快報》（*Sussex Express*）當時的表述：彭定康的「紙偶場景強烈有力地表達了協會的信息：對於失去英國最後一個主要殖民管治地感到憤怒」。[3]

在報導中，《蘇塞克斯快報》並沒有解釋「商業廣場篝火協會」表達憤怒的確實原因：是否因為要承認，達爾文在其書中所說的「英國世界體系」（British World-System）的完結，[4] 終於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徹底地出現，並代表了英國的完全「衰退」? 還是因為英國在距離1989年的風波僅僅八年後把600萬治民交給了中國管治？又或其實是抗議戴卓爾夫人1980年代初談判失敗後的退讓，而她在其中一次會議後公開摔倒，更成為了這退讓和屈辱的象徵？[5] 以上這些主題或看法其實早已在數月前，也就是香港回歸前的數天，在英國全國性的媒體報導中出現過。如《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記者安・萊斯利（Ann Leslie）以措詞嚴厲的語調描述6月30日香港被交還：「午夜鐘聲響起，這個狂野、炙熱、迷濛且璀璨奪目的地方，住着630萬自由和充滿活力，但前程飄搖的人們」，最終還是要交回跟英國的政治文化與模式這麼不同的中國所管治。[6] 而同為《每日郵報》撰文的保羅・伊斯特曼（Paul Eastman）則沒有那麼專注於新政權的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是更多地把焦點放到解放軍的貪腐上，批評他們經營夜店、養豬場、冰淇淋店和情色娛樂事業，並在香港回歸之日得以控制香港。[7] 萊斯利在報導香港回歸的儀式時，表達着英國的受傷情感，她批評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演說，認為他在演詞中沒有提及英國曾「幫助這個原本是南中國海的『荒瘠之石』變成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具活

2. 'Wet, Wet, Wet, but It Was Still Superb', *Sussex Express* (7 November 1997), 23.
3. 'Tableau Marks Retreat from Hong Kong', *Sussex Express* (7 November 1997), 25.
4.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 可參閱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s Betrayal and China's Triumph*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6), ch. 4; John Flowerdew, *The Final Years of British Hong Kong: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 Withdraw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ch. 3; David Bonavia, *Hong Kong 1997: The Final Settlement* (Hong Kong: FEER, 1985), 99。
6. Special Report from Ann Leslie in Hong Kong, *Daily Mail* (28 June 1997), 10.
7. Paul Eastman, 'Howe Breaks Ranks over Colony Party', *Daily Mail* (30 June 1997), 21.

力、最自由的經濟中心」；[8]而艾倫・馬西（Alan Massie）則認為查理斯王子在儀式上的「沮喪」表情反映了英國君主制本身的衰頹狀況。[9]

雖然《每日郵報》的報導呈現着英人受傷的自尊，但《太陽報》（*Sun*）和《鏡報》（*Mirror*）的報導則都強調着英國的成就。對《太陽報》而言，英國對香港最為突出的貢獻是建立了「公平且受尊敬的法律制度」、打擊貪腐、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場以及龐大的基建發展規劃。[10]報導中沒有顯出一絲的傷感，相反地是帶有善意和一貫的輕鬆風格，包括在標題中趣味地使用了雙關語。報導總結道：「香港人民大多歡迎新的管治……再見，香港。認識你真好。」《太陽報》甚至將其著名的「三版女郎」專欄獻給了這一時刻，展示一位英國出生而父母來自香港的華裔女子的照片。照片下的標註寫道：「給大家一點香港風情，來標誌今日英國曾管治的香港歸回北京：23歲的 Ivy Yeung，她的父母是華裔。當然了，我們這位住在湖區的三版女郎，無論哪天都值得一看（Peking）【譯註：此段中北京舊名 Peking 與英語『一看』異字同音】。看看她的雙手掩蓋（hand-over）之處（即：胸部）【譯註：『雙手掩蓋』在英語中與『移交/遞交』一詞同字異用】。」[11]《鏡報》的報導雖然提到這是一個傷感的時刻，但更強調英帝國主義的成功和結束：「我們當中沒有一個在看完這個最後的儀式後，不為自己作為英國人而感到驕傲的……香港是本國如何曾得以幫助其他的國家取得如此多的成就的一個象徵。」[12]

若單看香港移交時坊間的報導，很容易會誤以為香港這麼細小的一個地方對英國的國家身分認同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如果一個普通的讀者剛巧在1997年6月底到7月初那幾天完全錯過了媒體的報導，則相反地會以為香港在英國人的意識中幾乎毫不存在。正如巴克利（Roger Buckley）當年曾指出，香港在英國社會中常常是不顯眼的；他舉例說，1963年4月下議院的一

8. Ann Leslie, 'A Tearful Salute to the Last Jewel in the Crown', *Daily Mail* (1 July 1997), 1.
9. Allan Massie, 'The Flag Comes Down but We Can Hold Our Heads High', *Daily Mail* (1 July 1997), 8.
10. Robin Bowman, 'Why I'm Staying on in Hong Kong', *Sun*, 30 June 1997, 6.
11. 'The Tasty Chinese Takeaway/So Long, Hong Kong', *Sun*, 30 June 1997, 7–8。不過奇怪的是，「三版女郎」竟然被擠到了第七頁，原來是因為當天的頭條新聞是拳手泰臣（Mike Tyson）咬掉荷里菲特（Evander Holyfield）的耳朵。
12. 'Look Back with Pride', *Mirror*, 1 July 1997, 6。也可參閱 Mark Dowdney 的畫報，'How We Turned Hong Kong . . . from This to This', *Mirror*, 28 June 1997, 22–23。

場有關香港的辯論在開始時只有十幾位議員出席，到辯論結束時才增至23人。不但如此，再進一步來說：

> 對香港的關注程度，多只限於當時獲得香港政府所關注並遞交的報告內容，比如「現在吃狗肉的人少了」又或是初級部長約翰•普羅富莫（John Profumo）的回答：「現代思想正逐漸趨向取消妾侍制度，我認為這會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這類事情。[13]

前總督葛量洪同樣在1968年的一個採訪中表示，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願意接受他的建議，放棄實施民主化憲制改革計劃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英國選民「對香港沒有絲毫興趣」。[14]

香港既不多受到公眾的關注，在英國文化的研究領域中也同樣地被忽略，而在討論「英國性」的學術研究中就更是少之又少了。這其實是並不令人驚訝的。維多利亞時代晚期是英帝國意識的最鼎盛期，也可以說是帝國對英國國家身分認同有着最強烈的影響之際，那時香港還只是一個蠻不顯眼的小地。當英帝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於地理上擴展至其最大的範圍時，如 Robert Bickers（畢可思）所說，香港相對地只是一個偏遠的「窮鄉僻壤」（backwater）。香港的重要性並非來自其自身，卻是作為進入中國的一道門；但事實上直至戰爭期間，香港這方面的地位是遠遜上海的。[15] 直至到了1949年戰後，因着中國的新政治形勢和管治意識形態的不同，就如卡萊頓所說，

---

13. Roger Buckley, *Hong Kong: The Road to 19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6, 79。大衛•博納維亞（David Bonavia）指出，在1984年12月下議院辯論《中英聯合聲明》時，只有8%的議員出席（見 Bonavia, *Hong Kong 1997*, 144）。根據 Bernard Porter 的說法，香港在這方面並非特例；1930年代，有關帝國的辯論通常也未能吸引許多議員參與（見 Bernard Porter, *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69–72）。
14. Rhodes College, Oxford, MS Brit. Emp. Si 288, Alexander Grantham, interview by D. J. Crozier, 21 August 1968, p. 12.
15. Robert Bickers, 'The Colony's Shifting Position in the British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in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842–1997*, ed. Judith M. Brown and Rosemary Foot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7), 39–40。也可參閱 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182（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後續引用均指1997年版）；Bonavia, *Hong Kong 1997*, 69。Lawrence Kadoorie 談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香港時說：「如果說上海是倫敦，那麼香港就是黑斯廷斯（Hastings）。」引自 Kevin Rafferty, *City on the Rocks: Hong Kong's Uncertain Future* (New York: Viking, 1989), 136。

香港成為了「對華經濟接觸最具吸引力的基地」，故此1950年代初，保留對香港的管治被視為英國的一個重要經濟利益，這點也成了當時英國對華政策的主要考慮。[16] 然而，特別是在1956年後，香港戰後這重要性，跟英國更為主流的社會論述：即去殖化、富裕社會和福利國家共識，都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的。而實際上同樣地，香港在「帝國思維」（imperial mind）中的相對不受重視，也反映了在英帝國史學的研究中，其中對印度、非洲、西印度羣島和殖民自治領的研究是佔據着主導地位的。[17]

可以說，因為帝國史學的研究一直相對地忽略了香港，故此關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英國性」與英國文化的研究也忽略了香港。不過在另一方面，香港在有關20世紀後期的史學領域研究中有所缺席，則源自去殖化這個不同的因素。理查德・維特（Richard Weight）提出早於1940年，英帝國對英國人的民族身分認同的重要性與意義已經大不如前。他舉例說，很多宣傳廣告中所出現有關「帝國」的字眼或概念，已經在1930年後逐漸減少，「帝國日」（Empire Day）也漸被取代和消失。[18] 凱瑟琳・豪爾（Catherine Hall）在另一研究範疇的討論中也提到，在去殖化的時期，「白人英格蘭對帝國的遺忘現象」十分普遍。[19]

帝國與宗主國本土的歷史發展有着「相互構成」（mutually constitutive）的關係這看法，在有關19世紀的研究中，已經是一個獲得學者們廣泛同意的觀

16. David Clayton, *Imperialism Revisit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950–54*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7), 99.
17. 當然，也有明顯的例外，包括 Philippa Levine、Susan Pedersen、羅傑・路易斯（Wm. Roger Louis）、高馬可、卡萊頓和麥志坤的作品。在1997年回歸之年出版的論文集 *The Year of the Handover* 中，達爾文認為，香港不符合傳統的非殖民化敘事，尤其是因為香港沒有實現獨立，這點可參閱 John Darwin, 'Hong Kong in British Decolonisation', in Brown and Foot, *Hong Kong's Transitions*, 16–32。當然，香港的政治和公民機構的發展，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又或是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的崛起，都是日益複雜的一個學術主題。這項研究使我自己對香港歷史的理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英國和大英帝國的歷史學家很少注意到。
18. Richard Weight, *Patriots: National Identity in Britain, 1940–2000*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2), 286–87.
19. Catherine Hall, *Civilis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5.

點，甚至促使了當中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討論。[20] 相反地，有關去殖時期的歷史研究在理解宗主國的本土文化與帝國文化之間的互動方面則進展較慢。沃德在2002年如此寫道：

> 就1945年後的時代而言，宗主國與邊陲殖民地之間僵化了的概念屏障依然十分牢固。一種根深蒂固的假設一直存在，就是去殖化對廣泛文化的影響僅限於在殖民地區出現，與戰後的英國社會與其本土文化的發展關係不大。也沒有人試圖去探討帝國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與社會意識形態在戰後的英國消亡後，給英國本土帶來了什麼的文化表現。事實上，有關帝國管治地區和宗主國的文化互動的討論隨着帝國的終結而消失。[21]

當然，從2002年直到今天，此荒漠的領域已經有了一些發展，如比爾・書雅茲（Bill Schwarz）、溫迪・韋伯斯特（Wendy Webster）、詹姆斯・查普曼（James Chapman）和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ull）等學者最近的著作闡明了1945年後帝國對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對國家身分問題的影響。[22] 然而，香港的故事明顯地違背着戰後數十年的去殖化趨勢，卻在英國文化的史學中未曾佔有過任何重要的地位。而貝爾根的重要著作《帝國後的餘波》正體現了這一點。貝爾根在書中提出了創新且極具説服力的觀點，認為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福利國家與去殖化過程相互交織，後殖民的議題成為戰後英國社會的重要構

---

20. 關於帝國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相互作用的討論，特別可參見以下文獻：John M. MacKenzie, *Propaganda and Empi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hn MacKenzie, ed., *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Andrew Thompson,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he Impact of Imperialism on Britain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Harlow: Longman, 2005); Hall, *Civilising Subjects*; Antoinette Burton, ed.,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Thinking with and through the N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atherine Hall and Sonya M. Rose, eds., *At Home with the Empire: Metropolitan Culture and the Imperial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至於認為帝國對本土生活的影響被顯著誇大的觀點，見 Porter, *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另見 Richard Price, 'One Big Thing: Britain, Its Empire, and Their Imperial Cultur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 (2006): 602–27。
21. Stuart Ward, 'Introduction', in *British Culture and the End of Empire*, ed. Stuart Ward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
22. Bill Schwarz, *The White Man's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Wendy Webster, *Englishness and Empire, 1939–19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mes Chapman and Nicholas J. Cull, *Projecting Empire: 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inema* (London: I. B. Tauris, 2009).

成部分。然而，香港在1970年代仍穩固地處於英國的殖民管治之下（儘管那只是僅靠着中國的默許），並且也是福利國家之前英國文化意識（pre–Welfare State Britishness）顯而易見的一個典型例子。但她的討論卻完全迴避了香港。[23]

當然，香港在戰後英國文化的**史學**中不大受重視的其中一個可能且理由充分的原因，就是香港在英國文化的**歷史**中本身就相對地不重要。而這一點也是有表證所支持的。除了194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許多英國人無法說出任何一個殖民地這一廣為人知的事實外，英國公眾對於香港也顯然地是缺乏認識和反響的。[24]哈羅德•英格拉姆斯（Harold Ingrams）1952年記述了一名英國郵政人員，質疑一位顧客稱香港屬於英帝國的一部分的說法，而在確認顧客正確之後，該員工堅持那只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25]而1961年為着推廣香港的工業和貿易而在倫敦成立的香港協會（Hong Kong Association）被看為是必要的，因為當時對香港「有着廣泛的無知和不少的排斥，很多人認為香港是血汗工廠和毒品與犯罪的溫床，並且對其涉及不公平競爭的投訴也比比皆是」。[26]根據1969年該協會的一份備忘錄指出，「除了對玩具的投訴或來自蘭開夏（Lancashire）對香港傾銷紡織品的指控外」，英國的媒體很少報導有關香港的消息。[27]而金馬倫（Nigel Cameron）在1978年的書中也提到其歷史著作是必要的，因為人們對香港有着廣泛的無知和種種的刻板印象：如毒品交易、警察貪污、「超級奢華」和蘇絲黃等形象。[28] 1981年，《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的一位記者也曾經指出，香港的故事很少在英國的媒

23. Jordanna Bailkin, *The Afterlife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24. Weight, *Patriots*, 286.
25. Harold Ingrams, *Hong Kong* (London: HMSO, 1952), 43.
26. CHAS, SI 17, 'Draft Letter to Mrs S. Yuen, Hong Kong', n.d. (1968?)。據輔政司白嘉時（C. B. Burgess）於1962年8月的發言指出，對香港的敵意是在1950年代後期才出現的新情況，而此前在1953年石硤尾大火時，國際輿論對香港持同情態度（見 C. B. Burgess, *Hong Kong's Image: An Address Given to the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by the Colonial Secretary the Honourable C. B. Burgess, C.M.G., O.B.E. on Tuesday, 28th August, 1962*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2], 7–8）。
27. CHAS, SI 17, 'Hong Kong's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UK', 18 February 1969.
28. Nigel Cameron, *Hong Kong: The Cultured Pear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ix, xiv.

後記：回歸後的宿醉

2013年8月，也是此書進入最後撰寫階段的時候，我收了一位24歲的碩士研究生，他的名字叫羅國暉。國暉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由於他比較年輕，對在英國管治下的生活並沒有太深刻的記憶；他在家裏不會使用英語交談，也從未去過英國。他的研究題目是20世紀初英國在上海的管治。大學最後一年，他撰寫了一篇關於英屬印度統治（Raj）的畢業論文。這樣的背景，對我來說其實也並不意外；我自己在研究生學習初期，也曾在研究英國與法國歷史之間猶豫不決，儘管我未曾踏足這兩個國家，也沒有任何與這些地方有關的個人聯繫。不過真正讓我驚訝的是，國暉對英國文化與歷史的強烈認同。而這種認同，可以說讓被稱為英國迷的鄧永鏘所表現的親英情結顯得完全相形失色。我開始收到他在署名中附上「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為結尾的電子郵件，也注意到他的辦公桌上擺滿了與英國有關的照片與紀念品——穿着蘇格蘭短裙的男子和軍團的標誌，當然還少不了的是英女王的肖像。在他參與的一次宿舍新生迎新活動中，他自我介紹為「女王的忠誠僕人」，我仍記得坐在他旁邊的英國交換生聽到後，臉上出現了錯愕和一頭霧水的表情。

毫無疑問，國暉是一個特別且極為罕見的例子。然而，在撰寫這段文字之際，中國已經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達17年，但英國文化的影響，無論在實質或表面上依然有跡可循。當然，香港仍有相當數量的英國人，無論是長

居還是短期逗留的；但2009年在港的英人數目是19,000，相較於大約50,000名在港美國人，數量差得很遠；與來自亞洲其他地方的非華裔人士相比，包括菲律賓人、印尼人、泰國人和印度人，則更是相形見絀。[1] 在一個人口超過700萬並以華人為絕大多數的城市裏，稀少的英國人數顯然不是英國影響力延續的主要來源。相反，持續的英國文化影響更多是歷史遺產的體現，而非當代跨國聯繫的結果。這既得益於英國管治時期常令人想到1980年代香港的「黃金時期」，和當中所具有的懷舊情感，但同時也與特區政府在推行重大改變時相對審慎有關。這些因素共同讓英國文化的影響得以因循慣性而延續下來。

只要留心觀察一下，英國治理時所留下來的跡象依然不難找到，儘管人們對來自內地的文化與政治所帶來的變化會感到擔憂。但是這些憂慮，往往夾雜着對過度旅遊現象的不滿：包括投訴遊客的粗魯與無禮行為，和抱怨為了迎合遊客購物需求而導致社區面目全非。香港政府在2014年仍大體上保留了英國所建立的那種官僚體制和以規則導向的特徵。[2] 媒體仍然自由且活躍，雖然也有批評者認為媒體的報導日漸傾向過於審慎，而財務上的壓力也使批評政府政策的聲音有所減少。坊間對偶爾發生涉及對記者的暴力襲擊，也會有所猜疑，認為可能與政治有關。[3] 而到2014年9月，也能找到對普選過渡進

1. Caroline Knowles and Douglas Harper, *Hong Kong: Migrant Lives, Landscapes, and Journe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12–13.
2. 有關1997年後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可參見 Gordon Mathews, Eric Kit-wai Ma, and Tai-Lok Lui,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3. 參見 Carol P. Lai, *Media in Hong Kong: Press Freedom and Political Change, 1967–200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及 Martin Lee, 'Hong Kong's Shaky Democratic Future', *New York Times* (13 March 2014), accessed 1 October 2014, www.nytimes.com/2014/03/14/opinion/hong-kongs-shaky-democratic-future.html)。黎佩兒（Carol P. Lai）的研究巧妙地借鑒了在西方語境下發展出的分析框架，特別是媒體研究中的激進與自由主義傳統。為避免觸怒「中國公司」（China, Inc.），一份香港報紙以保護廣告收入及母公司在中國內地的業務，而選擇自我審查，與美國媒體避免冒犯企業贊助商的情況類似，例如 NBC News 曾低調處理其母公司通用電氣的負面新聞。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公司在香港本地的主導地位遠超美國單一《財富》500強企業的影響力。黎佩兒的書還展現了殖民管治時期香港主流媒體較少批評政府，以及1997年後主流媒體相對遷就北京的顯著延續性。如需對比西方國家的媒體，可參見 Robert W. McCh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程不滿的聲音，並有學生罷課的社會事件，表達反對有限制性的選舉制度。然而，司法獨立依然穩固（誠然，也有人仍認為其未來的延續性有待商榷）。但諷刺的是，在特區成立後的首15年中，對獨立司法體系最顯著的一次挑戰，是有關菲律賓和印尼外籍家庭傭工是否應享有居港權的申訴。在此案中，香港輿論與政府立場一致，反對下級法院的裁決，而在終審法院最終支持政府立場之前，有不少人猜測政府可能會繞過法院，向北京尋求對《基本法》的重新詮釋；[4] 此外，北京在2014年6月發表的《白皮書》中明確指出，香港享有的相對自治僅是中央政府的「恩典」，在不少人的眼中，這似乎代表了北京跟人們一直所預想的一樣。然而，到了特區50年期限的三分之一時，里德、博德特和索魯在有關香港回歸的小說中所描繪的那些末日情境，顯然並未沒有出現。而比如截至2014年時，一些大型的集會仍繼續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5]

儘管如此，也並非說人們的擔憂毫無根據。隨着中國日益強大，在區域內展現出影響力，不過也導致了與日本、越南和菲律賓之間的一些摩擦加劇。內地移民穩定地抵消了香港極低的出生率，香港人感到緊張也是能夠理解的。[6] 與其說香港人感到緊張，倒不如說他們有警惕地希望維護本地與內地的體系和文化差異，也或許這正是1997年後香港政治與經濟體系得以保存的原因。例如，2003年7月1日，面對大規模示威遊行後，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撤回根據《基本法》第23條「反顛覆法」所草議的提案，這是最重要的例子，但也並非是唯一的例子。比如2012年就著教育課程改變的抗議活動，似乎也同樣體現了香港人對自身文化與內地文化差異的一種焦慮。與此同時，顧汝德則認為，這種對權利的捍衛，某程度上犧牲了對社會民生權益保障的積極性。在香港缺乏活躍的「福利倡議團體」的情況下，行政主導的政府須順從於本地「大亨」的利益，對於飆升的樓價、公共服務的削弱以及極端收入不平等這些社會問題，也缺乏了明確的訴求渠道。正如顧汝德提到，在削減預

4. Lau Nai-Keung, 'Govt Should Stop Passing Buck on Basic Law Interpretation', *China Daily Asia* (4 October 2011), accessed 1 October 2014, www.chinadailyasia.com/opinion/2011-10/04/content_69666.html.
5. 再版註：特區政府因防疫考慮，未於2020年及2021年批准大型集會，而截至2023年，政府仍然相當謹慎，較為敏感的大型集會沒有出現。
6. Robert Kaplan, *Asia's Cauldr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4).

算後，行政長官曾蔭權自滿地否認醫管局的服務不足，聲稱老人只是誇大了自己的健康問題，而政府診所排長龍的現象僅僅反映了老年人喜歡社交的特性。[7]

令人意外的是，大約從2011年起，在一些社會活動中，回歸前的香港旗幟常常會與印有紫荊花圖案的香港區旗一同出現。[8]儘管這或許反映人們對九七前的管治有某種認同，或者至少是對過去的一種懷念：那時候人口尚未過度擁擠、收入尚未因後工業化而停滯，是有着「美好時光」的一個「黃金時代」。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若按照任何合理標準衡量，香港在2017年選舉行政長官時獲得的有限選擇權，其實已經遠超過英國管治時期最後一任總督在職時香港人所擁有的權利。即使有人不認同當時的策略，但邏輯上也並不能合理地聲稱，英治時期有任何既有的民主制度在九七後被推翻了。若如韋安仕所說，彭定康政府所帶來的「更大政治獨立性與政治自信精神」是英國留下的「遺產」；那麼，由香港以外的委員會最終任命最高級官員的非民主式做法，也同樣可以說是英國人留給香港的「遺產」。此外，在香港「黃金時代」的高峰期，政治部對異見團體進行監控的做法亦不容忽視。因此，在社會活動中展示英國管治時期的香港旗幟，其邏輯顯然是值得商榷的。[9]再者，以該旗幟表達對民主和「香港人」身分的支持，特別是在表達政治訴求並同時宣泄對經濟民生不滿之時，也顯得頗具諷刺和矛盾意味；畢竟，英國自身的民主政府在2010年後推行緊縮政策，包括削減社會福利、提高大學學費、實施零工合約（zero-hour contracts）以及「以工代賑」（workfare）措施，這些政策在2011年3月引發了大規模示威，當時多達50萬名抗議者走上倫敦街頭表達不滿。[10]另一邊廂，香港則同期擁有在世界上最為現代化的基建之一，港鐵公司甚至受委託營運倫敦的一條地面鐵路；相比之下，根據英國一位經濟記者在2012年的說法，英國僅需再過兩年就會淪為「第三世界經濟體」。[11]

---

7. Leo Goodstadt,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曾蔭權對醫療保健的評語，見第140–41頁。
8. *SCMP Debate*, *SCMP* (19 November 2002), 8.
9. Stephen Vines, *Hong Kong: China's New Colony* (London: Orion Business, 1999), 90–91.
10. Mary O'Hara, *Austerity Bites: A Journey to the Sharp End of Cuts in the U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11. Larry Elliott and Dan Atkinson, *Going South: Why Britain Will Have a Third World Economy by 2014*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至於其他英國遺留下來的痕跡，雖然可能僅停留在較為表面的層面，卻依然成為了本地文化的一部分。例如，香港七人欖球賽即將迎來40週年，這項比賽不僅延續了香港與英國運動的聯繫，還成為了一個充滿歡樂氛圍的盛會；而在2014年，警方甚至貼心地提醒參賽的運動員，要提防那些「趁他們喝醉時想向他們埋手的魁梧女士」。[12] 此外，儘管也許有一天，回歸前的貨幣會逐漸不再流通，不過截至2014年，印有女王肖像的紙幣仍然是並非罕見的。而香港和九龍的一些重要街道也依然保留着舊時的印記，例如：皇后大道（Queen's Road）、彌敦道（Nathan Road）、軒尼詩道（Hennessy Road）和梳士巴利道（Salisbury Road）。不過，也有一位西方記者在2014年9月底社會運動剛開始時曾指出，位於中心地段，前稱為威爾斯親王大廈的「人民解放軍駐香港軍營」，是政權交接後特區政府刪去的名稱之一。[13] 2007年，在英國管治時期「英國總督及皇室成員抵達香港島時的傳統登陸地點」，即皇后碼頭（Queen's Ferry Pier）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現在的中環渡輪九號碼頭（Pier Number Nine），而在整個過程中，也觸發了抗議、絕食行動以及法律挑戰。[14] 同樣是在2007年，當我簽署一份租賃合約時，驚訝地發現我的地產經紀仍使用頂端印有英女王名字的回歸前的標準格式表格。而在2009年，我人生第一次在香港購買住宅單位時，需要同時簽署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合約；而在合約的內容中都明確地標明，若兩個版本有任何差異之處，則以英文版本為依據——儘管我只能依賴妻子對中文版本的解讀。

前文曾提及，香港戰後時期所引入的西方文化影響，遠不止局限於英國。比如香港中文大學的創立，除了受英國文化的影響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國文化的影響。而就算在香港回歸前，美國的電視與電影作品也經常比英國的對應作品更為普遍流行。在香港特區成立的第二個十年中，大學體

12. Clifford Lo, 'Rugby Sevens Revellers Warned of Powerfully Built Women Who Prey on Drinkers', *SCMP* (28 March 2014).
13. Bruce Einhorn, 'Hong Kong's Angry Protests: What Now?',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9 September 2014),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14, 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4-09-29/protests-rock-hong-kong-and-china-dot-what-comes-next.
14. Chloe Lai, 'Declaration Challenges Queen's Pier Demolition', *SCMP* (19 April 2007); 'HK "Can Demolish" Colonial Pier', *BBC News* (10 August 2007), accessed 1 October 2014,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6940160.stm; Richard Spencer, 'Hong Kong to Lose Historic Pier', *Telegraph*（1 August 2007）；此處引文出自 Chloe Lai 的文章。

索引

（筆劃序）

九龍，歷史，11，20，23，28，124，126，128，150；景觀，37，61，93，108，110，119，120，121，122，133，223；生活，62，92，111，173；其他，78，86，88，112，113，158，168，177，208，213

九龍城寨，62，88，112，113

人口，戰後人口變遷，15，16，23，24，25，28，29，33，49，73，88，98，100，106，111，118，119，122，128，140，145，148，173，175–77，181，182，185–87，192；人口密度與社會問題，31，37，43，63，71，76，86，101，105，110，112，115，120，126，127，130，131，159，168，201，204，211，220，222，225；人口結構與族群（華人、歐亞混血、白人、印度人等），6，9，21，26，65，132，138，141，147，150，160–62，164，165，184；人口與政治、經濟發展，18，26，35，42，57，74，93，134，150，151，163，164，199，202；其他，27，159，168

人民解放軍，17，211，212，223

工人/勞工/工廠，7，25，30，44，45，49，52，59，62，64，65，69–73，89，89n56，98，110，112，119–20，128，143，143n19–20，145，148n28，173，175，213，227；童工，66，70，71

工時，64，66，67

工業，7，23，24，27，29，45，47，50，59，60，70，71，72，105，116，124，126，127，128，129，130，132，141，148，149，150，157，176，222

中英聯合聲明，4n13，9，24，44，113，134，159–60，162，164，176，178，182，184–96，199，199n17，202

中國內戰，24，27，140

中國共產黨/中共，2，46n10，131，202，208，209，217

公共關係處（Public Relations Office），47

尤德（Edward Youde，港督，1982–1986），156

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Lord Palmerston），14，15；其他，105，177

文化大革命，24，28

水，食水供應，22，74，111，113，128，130–34，152–53；水庫與水壩，114，115，116，121，124，

125，128，142；基礎設施，105–7，121，123，136
水庫，基建與發展，106，113，114，123，125，131，133；搬遷，124，142；水利供應，131，133；食水短缺，124，130，131，132
去殖化，xiii，xiv，xv，5，6，9n33，25，26，43，76，158
外籍人士，6，7，13，14，15，35，36，37，42，43，45，50，62，65，76，82，92，96，99，120，190，193，198，205，211，213，216，221，222，226，228
尼爾•金諾克，161，162，171，180
民主，4，14，53，136，138，139，140，145，148，154–65
民族主義/國家認同，13，19，26，169，172，224
犯罪/罪案，34，52，84，102，106，108，118，119，120，143，153，154，182，201，202，205，208，209，211，212，214，224；有組織犯罪，7，50，52，73，84，97，120，174，208，209，210，211n50，216
石寶德（Malcolm Shepherd，男爵，外交事務大臣，1968–1970），148，149
交通，系統網路，71，105，106；港鐵（MTR），130，152；隧道，105，106，130；其他，64，82，83，108，118，159
企業家精神，50，61，68，75，101，105，110，114，138，180，200，209
共產主義，1，2，4，13，19–22，24，31，34，40，44，50，53，59，64，66，71，84，130，132，135，139，153，157，171，174，177–80，186–90，200–204，209，213，216
同性戀，39，42，101，102，103
回歸/移交，2，3，5n17，9，10，12，19，22–25，35，37，42，43，46，47n14–15，48n17，49n18，49n21，50n24，50n26，51n27，51n30，54，76，90，91，98，104，124，126，129n90，134，136，153，155–56，162，164–65，168–69，173–76，178–80，186–207，201n22，212，214–15，221–23
安德魯•福爾茲（工黨議員），93，169，183，187，199，199n17，228
江澤民，2
自由，xix，2，45，47，55，56，58–60，72，98，106，128，137，139，141，143，157，160–61，176，177n39，178，187–89，191，194–95，198–99，201，203–4，213，218，220；經濟自由，3，27，47，49，53，54，58，59，70，73，74，104，113，128，132；自由市場，3，27，48，51；自由貿易，47，55，58，139，191，195
自由放任市場經濟，27，48–51，53，54，58，63–72，106，113，128，132，139–42，148
艾倫•埃利斯，153
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辦事處，180，184，185；行政局與立法局非官守議員，149，178，180，188，189；市政局，27，74，83，129，140，141，158，159，176；政府新聞處/資訊服務處（GIS），45，72，92n68，104，128，133，149，149n35，157
冷戰，13，15，18，21–22，25–26，43，47，93，124，212。另見韓戰；美國對中國的禁運
改革，民主政治，4，25，41，59，68–70，74，75，83，84，120，

138–40，142，145，148，151–55，158–60，161–65，169，172，176，198，199；麥理浩改革，59，138，145，148，151–52，153n49，154；中英關係，138–39，142，198；社會管治，59，148，154–55，163–64；批評/限制，152，158–61，163–65，199
杜葉錫恩，16，60–62，69，75，103，150–51，153–54，159
沃爾特•伊西，34，52，73，201，201n22
良政治理/良好管治/德政治理，14，45，47，84，104，106，129，137–162，166，192，194；不干預政策/方針，14，44–54，63，65，106，129，138，139，141，145，148，164，186，191，203
妹仔，76，143
怡和洋行，54，56，56n45，76，135，193，201
性/性別/情色，15，85–104，213，214
房屋/居住情況，29，49，49n19，74，83，106，110–20，126–28，141，145，152，159，206，221；公共房屋/公屋邨，49n19，73，110，114–19，128，141，145，152，159；寮屋/木屋區，67，73–74，83，87，106，111，114–18，124，127，132；石硤尾大火（1953年），7n26，106，114，118
法律/法規/法治，3，9，28，32，39，46，54–56，60，62，64，83，84，94，102，103，118，119，125，139，141，143，144，153，154，161，166，175–77，188–90，193，196，198，199，209，214，223；基本法，196，199，221
金馬倫，7，53，67，88n51，118，168n6，200
保守黨，47，59，70，71，161，162，181，187，194，203
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53，60，105，118，123，134，157，160，200，206
威權主義，51，60，138–44，147，158，161，162，165，204
政府：行政局，26，141，142，149，178，180，181，189；立法局，26，84，141，142，149，158，160–64，176，178，180，184，185，189，199，215；鄉議局（新界），142–44，158
政治風波（天安門，1989），2，24，25，43，135，136，161，162，164，176，176n37，179，180，180n53，182，183，186，188，194，199，203，205，208；維園活動，205，221
柏立基（香港總督，1958–1964），84，130–33
查爾斯•義律，14
柯利達，24，135，136，180，195
毒品，7，56，72，73，102，110，112，113，174，207，210，212；毒品貿易，7，56，56n45，174，210，212；海洛英，73，113，174，211，213；鴉片，14，55，56，62，71，76，121，122，213
美國資訊服務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14
美國對中國的禁運（United States embargo of China），26，29，72。另見冷戰
英國人卓越管治，xii，45，46，63
英國工黨，25，53，58，59，93，161，162，169，176–77，180，182，196，202
英國文化協會，14，22，44，50，59，77，172

英國世界體系，1–3
英國外交部，18，134，135，136，162，187，195
英國自由黨，93，185，196
英國性/英國精神，xvi，4，5，6，12，13，15，37，38，47，49，52，55，106，138，168–92，220，221
英國國籍法（1981年），177，178，179
英國廣播公司（BBC），10，11，16，20，36，66，167，205
英聯邦，9，17，30，32，116，148，173，176，177，184，188，196
英聯邦移民法（1962年），173，177
香港印度社團總會，187，188n82
俱樂部/會所/夜總會，華人會，82；中華遊樂會，81；木球會，81，83；香港外國記者會，130，131；香港會，16，42n104，50，68，81，82，83，142，152n48，225；香港高地人協會，84；香港賽馬會，52，69，142，208；香港扶輪社，31；香港聖安德烈會，84；聖大衛協會，84；香港聯青社，176；香港婦女遊樂會，81；夜總會/夜店/情色娛樂場所，2，42，89–93，102，109，203，209，225；香港革新會，83，84；其他，2，15–17，30，34，35，39，40，42，75–78，98，99，101–4，152，167
夏慤（副海軍上將，戰後香港軍政府總司令），46
孫中山，19，129
旅遊業/遊客，生活消費，13，35，87，89，91，93；美國遊客，40，94，210；香港旅遊協會，108–9；指南，101，113，122，168；社會影響，201，220
紡織，7，72，119，129
馬卓安，135，136，162
商業/生意/營商，商人/生意人/商界，92，106，134，139，142，159，160，213–15；其他，31，41，43，48，49n19，57，58，61，69，71，108–10，112，129，149，153，168，185，186，193，200，201，204，215，225
教育，29，41，49n19，60，62，75，76，82，110，115，127，129，145，152，157，159，168，170，172，186，190，221，222，224，226
現代化，概述與論述，xvii，xix，14，84；秩序與現代化，103，105–7，109，111，113，115，119，121–23，125，127–29，131，133，135；新界與規劃，120，122，124；後期討論與遺產，167，168，194，201，206，211，222
移民/移居，香港移民海外，24，59，179，181，182，191，203；移民英國，9，165–77，177n39，181，182，183n65，185–89；居英權，xx，177–89，183n65，188n82，195；移居香港，27–29，36，37，44，45，49，65，76，77，111，112，114，115，126–28，138–39，145，150，204，206–8，211，221
貧困，隱喻/形象，37，47，56，65–69；社會經濟，73，74，87，88，94，96，110，168，187；道德責任，65，66，73，74，88，94；家庭脈絡，87，88，94
貪腐，2，3，8，9，12，47，52，53，54，59，60，61，119，120，145，150，152，153，154，164，192，198，205，211，212；反貪，2，7，12，53，60，119，120，150，153，

154，164，192，198；廉政公署，54，153，154，216；《防止賄賂條例》（1968），153–54
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香港總督，1971–1982），xvii，23，48，59，68，103，134n90，139，145，151–55，151n46，151n48，152n48，159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27，47，70
媒體，輿論/社會文化描述，2，3，7，10–12，20，66，91，102；戰後及冷戰期報導，12，16–17，156–57；狀況，77，78，156–57，199，220；其他，12，36，133，161，195，198，199
彭定康（Chris Patten），2，13，45，46，77，134，136，138，162–64，195，198–99，204，222
殖民地部/殖民地事務部，4，18，24，41，47，88，141
華人性格/中國性，44，45，46，63，64，65，66，67，68，69，105，139，160，161，162，203
華人英國性，15，166–92
貿易，體系，17，24–27，29，44，46–47，50–52，54–56，64，73；意識形態，123，132，139，141，160，167，176，180，183，187，191，195；其他，7，13，35，76–77，132，211
越戰，8n30，13，26，93，93n72，94，183
傳教/宣教士，倫敦傳教活動，11；中國傳統，13；杜葉錫恩背景，17，62；九龍城及草根社區，61，63，88，113；We Live in Hong Kong，74；教會檔案與文獻，227
新市鎮，48，125–28，129，134，158
新界租借，xiv，20，23，24，32，59，83，92，93，112，119–27，129，134，142–44，150，156，164，172–75，194，196，200
新聞自由，戰後早期，2，3，7，10，12，16，31；新聞自由與政府，39，60，72，92，116，128，133，149，161，193，215；審查，72，92，128，149，157，161，193，220，220n3；新聞機構與專業報導，34，52，68，79，80，86，87，89，91，102，103，130，157，174，185，194，217，218，220，224
楊慕琦（香港總督，1946–1947），139，140，172
經濟奇蹟，15，36，38，44，45，61，62，63，138，182
經濟發展，2，9，23，26，27，29，44，45，47，48，49，60，65，70，73，105，106，115，123，124，125，126，127，127n63，128，129，135，139，142，152，161，176
葛量洪（香港總督，1947–1957），xvii，4，17，39，64，107，122，139，172，229
詹姆斯•克拉維爾，13，38，45，54–63，130
資本主義，14，43，44–74，75，76，104，106，124，128–29，145，167，194，203，204，212，225，226
跨種族婚姻，38，40，41，42，85，99，208
電視，政策與機構，78，129，172，228；社會文化，119，122，193，223；國際海外，11，216，217
福利，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5，6，7，47，48，49，49n19，52，53，

74，75；香港社會福利，59，64，66，71，73，88，106，115，137，138，145，159，164；其他，181，182，184，185，186，206，221，222
種族（Race），殖民與種族，5，19，25，26，34，37，38，39，40，41；身份與社會，30，39，40，42，58，64，66，67，82，83，84，85，99，110，124，125，143，144，150，165，166，170，172；種族互動，39，40，41，66，83，85，165，169，172，173，174，181，182，187，188，202；權力與歧視，26，38，39，58，124，125，143，150，165，166，172，181，187，188，202，213，214，224
種族分隔，30，34，39，40，41，99，124，125，143，150，165，166，187，188，202
管治認受性，xvii，14，24，29，48，74，145，153，155
遠東經濟評論，7，31，38，41，48，60，100，109，123，134，150，151，177，196，229
銀行業，香港上海匯豐銀行，59n57，68，69，73，142，193，201，208；其他，18，31，34，59n57，68，69，73，110，139，142，170，190，193，201，208
潘靈卓，62，75，88，113
蔣介石，18
衛奕信（港督 1987–1992），135，136，162，195
賣淫，社會經濟，73，76，86，87，88，89，93，94，97，98，99，101，103，104，112，189；性別/家庭，87，88，93，94，95，96；文化描繪，2，15，34，62，67，75，76，93，99，216；管制，93，101，103，112
鄧小平，23，24，134，136，159，194，208n45
鴉片戰爭，14；鴉片，55，56，62，71，76，213
儒家思想，48，137，142，161，172
機場，赤鱲角機場，130，134，135，136，198；啟德機場，126，134，135，201；其他，105，126，130，134，135，136，198，201
餐飲業/餐廳，36，41，42，64，82，93，110，112，115，116，173，174，206
鮑威爾 • 以諾（Powell, Enoch），181，182
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訪港與中英談判，ix，23，56n45，134，159，196，197，205，208，210；政策理念，48，56，70，71，186
戴卓爾政府，70，71，161，194
戴麟趾（香港總督，1964–1971），20，48，59，148，151，156，229
韓素音，30，40，40n93，40n94，45，214
韓戰，26，29，72。另見冷戰
羅素 • 約翰斯頓（自由黨議員），93，185，196
難民，戰後移民，16，17，19，22，24，27，28，33，37，42，44；社會經濟影響，57，58，59，63，64，65，66，71，72，73，82，87，94，115，119，124，128，139，145；國際，133，138，164，172，173，175，183，186，205，215，226，227
警察/警隊，組織與運作，7，8，9，32，34，42，52，60，62，68，89，94，97，102，103，110，113，118–20，

123，153，163，200，210，211，214；政治部（Special Branch），107，157，222；腐敗與改革，8，60，94，103，119，120，147，152–54，163，214；皇家稱號與地位，53，60，147，214；殖民統治與警察角色，31，32，68，118，123，147，153，154，168，175，200；文化描繪與形象，42，62，73，79，89，94，97，148，199，211

騷亂，香港1967–1968騷亂，xvii，xx，8，10，24，31，64，74，83，108，119，145–49，157–59，164，177；1956年九龍騷亂，72，108；1966年天星小輪騷亂，74，108，145，148，149

蘭桂坊，42，102，189–90，209

顧汝德，48，49，51n28，67，109，110，114–16，118，221

體育，欖球，79，83，223；賽馬，52，69，82，142，203，208；游泳，34，50，80；其他，15，30，57，75，76，78–81，83，85，103–4，167

灣仔，夜生活，90–92，94–96，98，99，101，109，212，216；外籍人士，86，99；生活空間，92，96

英國文化與香港 1945–97

「本書深入剖析英國文化與香港的互動——作為英國殖民管治中最成功但相對較少被研究的地區之一。作者馬翰庭巧妙地展現了英國人如何想像香港及其居民，英國人在香港的實際生活情況，以及在去殖化時期香港人對英國的看法。作者運用豐富的歷史資料，為我們帶來了這部既振奮人心又極具創意且易讀的研究專著。」

——**菲利帕・列文**（Philippa Levine），德克薩斯大學

「《英國文化與香港：1945–97》是一部研究細緻、考證嚴謹的著作。作者馬翰庭引用了大量豐富和多樣的史料，包括官方文件、新聞報導、學術著作及大眾話語。深入探討戰後英國及香港如何理解和詮釋香港的『英國性』。這本書在香港歷史與英國文化史研究中均屬開創性，是首部引導我們思考英國文化如何與香港歷史互動，和關注其重要性的專著。」

——**江偉欣**（Vivian Kong），著有《多元種族的英國性：全球網絡在香港，1910–45》（*Multiracial Britishness: Global Networks in Hong Kong, 1910–45*）。

「本書高屋建瓴，考證縝密，揭示英國評論人對香港轉型的多種觀點——從讚嘆其由『荒瘠之石』蛻變為活力之都，到批評其金錢至上及非白人特質。」

——**麥志坤**（Chi-kwan Mark），《社會史學報》（*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英國文化與香港：1945–97》探討 20 世紀下半葉英國文化與香港的互動，闡明香港如何在英國去殖民化敘事中佔據一個特殊的位置，同時作為英國在停滯與衰退時期反思自身文化的偶爾對照。透過廣泛引用歷史檔案及已出版的第一手資料，作者深入研究多個主題，包括香港作為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與良好管治的場所，以及作為男性社交與性別機遇的景域。本書亦探討香港華人如何吸納英國文化，以及英國觀察者對香港回歸中國主權未來所提出的各種不同預測。

馬翰庭（Mark Hampton），現為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羅美嫻（Ring Mei Han Low），現為香港珠海學院英文系助理教授。

封面圖片：皇室訪港（《香港年報 1976》）。女王在九龍一個公共屋邨停步，與前來迎接的數以千計市民交談。圖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

歷史 / 亞洲研究 / 香港

ISBN 978-988-8900-88-6

9 789888 900886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ttps://hkupress.hku.hk